

5. Ланьков А. Н.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Южной Кореи URL: <http://koryo-saram.ru/demograficheskie-problemy-yuzhnoj-korei/>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2.09.2015).

6. Члены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семей все чаще сталкиваются с дискриминацией // Российско-корейско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РУСКОР. 02.03.2013. URL: <http://www.ruskorinfo.ru/data/society/7907/>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15.09.2015).

7.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URL: http://www.bayefsky.com/pdf/korea_t4_cerd_71_adv.pdf (mode of access: 21.09.2015).

8. Yi Soon-hwa. Low-skilled labor migration: Korea's Employment Permit System URL: <http://blogs.worldbank.org/peoplemove/low-skilled-labor-migration-korea-s-employment-permit-system> (mode of access: 15.09.2015).

9. Employment Permit System. URL: <https://www.eps.go.kr/eo/main.eo> (mode of access: 28.09.2015).

10. Kwon Mi-yoo. Migrant Workers mark 3d Year After Yeosu Fire // The Korea Times. URL: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nation/2010/02/113_60575.html (mode of access: 23.09.2015).

УДК 323(510)-048.35+94(510)

焦 珣 璠

厦门大学

厦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

Jiao Yufa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China

历史视域中的中国梦

“Chinese dream”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实现什么样的中国梦, 怎样实现中国梦? 这是当今中国的主题。用一句话说, 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在当前的具体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中国现代化道路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的探索性寻梦阶段、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十八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追梦阶段、从十八大以来到提出“四个全面”的筑梦阶段。“四个全面”本质上是一场深刻

的革命，它是党对治国理政实践的新总结，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新战略布局。

关键词：中国梦；历史视域；路径。

What kind of “Chinese dream” we bring to life, as we bring to life the “Chinese dream”? This is the main question of today’s China. In short,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dream” is a great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s specific immediate objective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of China has traversed three stages. With the Opium wars to expand the Policy of reforms and openness was a stage of search that dream, to be follow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In 1978, the unfolding of the course of reform and openness began the second stage — the chase behind the dream of building in Chin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modernization, — he continued until the XVIII Congress of the CPC. With the XVIII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nomination of the political program of the “Four comprehensive aspect” marked the onset of the third stage of “creation” dreams. “Four comprehensive aspect”, in essence, there is a radical change, this new practical summary of everything that has made the PDA in the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is the latest strategic concept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hinese dream; historical context; ways and means.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就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迄今为止，人们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理解，中国梦的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的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寻梦：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探索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沿着改革开放的现代化道路，到21世纪中叶发展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因此，“中国梦”本身承载和记录着中华民族从饱受屈辱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复杂、波澜壮阔的宏伟历史。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这是中国人寻梦的时期，它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年-1921年。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内生、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在外力的压迫下被动地开始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现代化历程。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漫长、停滞的封建君主专制社会和落后的亚细亚农业文明生产方式在强势西方工业文明和炮舰政策的猛烈冲击下，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积贫积弱、丧权辱国、亡国灭种的巨大民族生存危机唤起有

识之士觉醒，他们开始了筚路蓝缕、救亡图存的中国现代化探索之路。

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步。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引入西方的工业技术。在经济上经历了从新式军事工业到民用轻工业，从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到商办的过程。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始创办新式学堂，培养科技人才。但是，洋务运动派试图保留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简单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不能变成资本主义强国的。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地主阶级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探索失败。

1895年后，“西学东渐”达到高潮，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与变革社会制度在各个领域展开。这一时期担负现代化任务的中坚力量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推行君主立宪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在“实业救国”的浪潮下，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近代化有了长足发展。资产阶级激进派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民主和科学，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开始由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但随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政权使资产阶级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成为镜花水月，随之而来的北洋军阀统治和军阀混战，又窒息了民族工业的生机。民族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探索宣告失败。

第二阶段：1921年-1949年。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打破国内对于商品、资源和资本流通的一切障碍，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和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仅仅只是打破了中国上层的皇权政治，但是在中国广大乡村之中，地主士大夫阶级通过土地依附控制着乡村的经济，通过宗法制度甚至武装控制着乡村的政治，通过天命论和封建迷信文化控制着农民的精神世界。正是地主士大夫阶级对于乡村的封建性统治隔绝了中国乡村与城市社会化生产方式的联系，导致中国长期停滞在自然经济的封建农业社会。而这个反抗帝国主义、实现中国主权独立和终结中国封建性乡村统治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本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但是在近代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却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一资产阶级革命的使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依附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密切联系的大资产阶级，他们残酷地剥削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挤压

民族资产阶级的生存空间，严重阻碍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由于中国的工业命脉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民族资产阶级又与封建乡绅地主阶级有着密切联系，导致其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动摇性。这两个阶级都完成不了领导中国进行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民族解放任务。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分田地、打土豪”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才真正地打破了中国乡村封建统治制度，消除了隔绝中国近代化城市与传统乡村的政治力量，建立了贯彻于中国所有层级的中央集权统治和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须的全国统一市场。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制定民主革命纲领，领导工农运动，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开创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新纪元。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在选择何种路径建立自由独立的民主共和国问题上也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探索过程。1927年，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指导下，放弃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酿成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时期发生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倾错误，又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革命阶段，一味照抄照搬苏联工人阶级城市中心武装夺权的十月革命道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只有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才真正符合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从而胜利完成了建立自由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一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独创性地提出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土地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以及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从小农社会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理论，并成功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建立起独立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第三阶段：1949年-1978年。建国后，怎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之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任务，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成为当时中国现代化的最迫切任务。在1935至1953年，毛泽东原本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二者之间插入一个过渡、衔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在这一阶段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完成其他国家在资本主义阶段完成的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任务，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物质前提条件。但随着建国后没收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在华资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大。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

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大大增强了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力量,改变了同民族资本家、地主、富农、知识分子等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提供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强大政治保证。1953年,中国共产党重新调整了国家现代化的蓝图,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加快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步伐,用现代化大生产改造自己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和自然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以更快地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消灭了中国几千年以来阶级剥削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后,党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道路的探索。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标志着中共开始独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1957年,“一五”计划的完成,重工业、交通运输业、矿业以及能源建设成就突出,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周恩来提出要更快地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取得显著的增长,GDP从1950年的约120亿美元增长到1978年的2260亿美元,并建成了能独立完成“两弹一星”、核潜艇和大飞机研发和制造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这一时期还取得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李振声的杂交小麦,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高产改造,疟疾新药青蒿素等重要科研成果;建立起普遍的公共服务体系,为人民提供普遍的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

总之,1957-1976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曲折探索中初步取得不可忽视的成就,为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当然,这一时期也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系列错误,左倾冒进地希望在10年或5年内通过群众运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急躁冒进地建立单一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后果,非但没有完成马克思在晚年设想中对东方落后国家所要求的、用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力对自身古代类型的生产方式进行改造的任务,反而扭曲了尚不够健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长期负面的影响。

二、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和深化

1978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作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由此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这一伟大历史性转变的根本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和深化，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起步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改革首先从经济体制最为薄弱的环节——农村得以突破，走过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放权让利、价格改革等微观或局部改革到政府职能转变、市场体系建设等全方位改革、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到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风险，秘密在一份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18个红手印，以“包产到户”的形式，率先开启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以农村改革为发端和重点，改革从最初的“自下而上”式的群众自发改革和局部试验，逐渐发展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有机结合的自觉探索与实践。随着“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实践的推广，最终确立了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完全改变了农村生产关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激发，农村生产力大大提高。农村改革和发展的突出成就，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经济”，这是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认识的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进入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国有企业简政放权、实行股份制、价格改革、计划、物资、投资及金融体制改革、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等的探索和曲折历程，从“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直至党的十四大最终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蓝图，成为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在这一目标和纲领的指引下，我国着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宏观管理体制框架初步建立，商品流通市场和资本市场建设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基本确立。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此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这一时期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健全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体制机制。具体体现在：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健全要素市场，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向纵深全面推进。

其二，改革与开放密不可分，中国的对外开放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而行。1980年5月，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按照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要求，在计划、投融资、流通、劳动工资、土地管理、财税、金融和政府管理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探索，有力地促进特区的经济发展，为全国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 and 借鉴，从而也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对外开放贯穿整个改革历程，从建立经济特区、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开始，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中西部，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进入 21 世纪，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坚持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相结合、实现自身发展和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相结合，与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贸往来，加入了一大批国际公约，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的规则制定，区域合作不断深化。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加入了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APEC)，积极参加亚欧会议，参与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与东盟建立“10 + 3”对话机制，推动亚投行的创立，为推进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亚太、亚欧经济技术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把挑战转化为机遇，中国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实现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推开放，实现改革和开放的良性互动，使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现代化进程中全面拓展。现代化没有固定的模式，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经济现代化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河，但中国不只是经济现代化，尽管它是全

社会范围内现代化的基础。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拓展现代化的内涵,逐步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总布局,提出了“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实践中全面拓展,中国社会发展朝着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1979年3月,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第163页]的命题,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并逐步形成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2,第16页]的“二位一体”现代化新布局。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拓展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3,第11152-11153页]。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4,第450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确定了历史方位,明确了奋斗目标。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实践以及对世界性现代化的深入了解,中国现代化的内涵不断得到扩展。2002年,党的十六大增加了新的现代化具体目标:“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时,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和谐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一项重要内容确立下来,使总体布局发展为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将现代化目标发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现代化等具体道路,是在逐步积累中不断发展的“多位一体”的现代化道路,是包含汉族、各少数民族等全体人口的现代化,是覆盖城市、农村、沿海地

区、中西部地区等全国范围的现代化,是包括土地、资源、能源、资本、劳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信息、知识和制度、法律等现代要素的现代化,是与世界多样文明激荡交流、相互融合的现代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人口最多也最成功的现代化实践。因此,改革开放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既立足国情又在实践中勇于探索创新的新路;是既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体现中国特色的人类社会多样发展的新路;是贯穿互利共赢精神、坚持世界和平发展共同进步的现代化新路。

三、筑梦:“四个全面”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

2012年底以来,中国的治国理政方略开拓出中国发展的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5],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四个全面”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为筑成中国梦提供了保证。

“四个全面”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新战略布局。十八大精神是“四个全面”的源头活水;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侧重于破,提出要变更与革新,破除束缚发展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障碍;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侧重于立,提出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谋求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破有立,重在建设。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重在提升治国理政能力。显然,这个战略布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特征,蕴含深刻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布局,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四个全面”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6]可以说,“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勇于创新的系统思想。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四个全面”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是党对治国理政实践的新总结。

“四个全面”贯穿着大局思维和系统思维，体现出宽广的政治视野和长远的战略眼光。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内、国际和党的建设三个维度，对“大局思维”和“系统思维”作了深刻阐述：从国内看，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国际看，就是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从党的建设看，就是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三个方面凝心聚力：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力量；用中国梦凝聚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力量；用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凝聚每个人创新和创业的力量。归根结底就是用“中国力量”支撑“中国精神”，用“中国精神”引领“中国梦想”。

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非易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深刻回答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它是对“实现什么样的中国梦、怎样实现中国梦”的新思考。

其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实现这一梦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此时任务更为繁重。

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要有新思路。发展不仅是当今世界主题，也是当代中国主题。无论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7，第20页]，还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8]，都是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比较突出。只有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利益藩篱，实现全面小康才有动力；只有全面依法治国，建立规则秩序、推进公平正义，实现全面小康才有保障；只有全面从严治党，锻造领导核心、提供政治支撑，实现全面小康才有保障。我们建成的小康社会是改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为此，要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公正感和尊严感。

其二，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全面深化改革，从根本上说是改革问题。全面深化改革着

眼于“如何攻坚克难以推进伟大事业”。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越要增强忧患意识，可以说，强烈的忧患、责任和担当意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底色。改革开放 37 年来，中国改革循着从易到难、从局部到全局、从增量到存量的顺序展开，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与过去相比，今天的改革既呼唤坚定果敢的行动、百折不回的信念，也呼唤全面系统的认识论、攻坚克难的方法论、以人为本的价值论。当前，“体制机制障碍”、“利益固化藩篱”、“突出的矛盾问题”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如何全面深化改革考验着政府的决心、勇气和智慧。要有“壮士断腕”、“敢于涉险滩”、“敢于啃硬骨头”的决心，要有“冲破体制机制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解决突出的矛盾问题”的勇气，更要有“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智慧，攻坚克难，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释放改革红利、拓宽中国道路。

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根本在“改革”，关键在“深化”，重点在“全面”。全面深化改革本质上是破除束缚中国人能力发展和发挥的种种不合时宜的制度、体制和机制障碍，为中国人的素质提升与能力发挥创设制度、体制和机制条件，最终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就不是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单项改革，而是全方位、配套性的“整体性改革”。具体而言就是：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9, 第 3 页]，激活市场的力量；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9, 第 4 页]，激活政府的力量；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9, 第 4 页]，激活文化的力量；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6, 第 4 页]，激活社会的力量；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9, 第 4-5 页]，激活环境生产力；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9, 第 4-5 页]激活总揽全局的力量。

发展催生问题，问题倒逼改革。改革由问题而产生，又在不断破解问题中得以深化，这揭示了改革的本质就是要解决问题促进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破除各种体制机制的弊端，才能破除利益藩篱的阻碍，也才能解决突出的矛盾问题。在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0, 第 251 页]的总依据，必须坚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 第 13 页]的总任务，必须坚持“五位一体”的

总布局,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总原则,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必须坚持“公平正义改革”的总方向。中国改革的目标是,最终要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局面。

其三,全面依法治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方略”。全面依法治国,从根本上说是治理问题。全面依法治国着眼于“如何推进伟大事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底线。全面依法治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数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来说,无疑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全面依法治国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深刻回答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等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回应和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期待。

近代世界,法治成为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主要形式。没有法治理念,不可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法治理念,不可能成为现代国家;没有法治理念,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如何全面依法治国?用法治手段巩固改革发展成果和引导创业创新,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全面依法治国既不能以“敢闯敢干”来触碰法律底线和法治红线,也不能以“改革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而懈怠拖延甚至推迟改革,而是要“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11],确保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深化改革。如果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既治不好国,也理不好政。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党要执政兴国,必须依据党章国法从严治党,必须首先依据宪法治国理政,这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党的十八大以来,宏观层面的“内政外交国防”、中观层面的“治党治国治军”,微观层面的“改革发展稳定”,无不以法治为框架、用法治作支撑、由法治来贯穿。在当代中国,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用“制度”的现代化为“物”的现代化提供保障,用“

人”的现代化为“社会”现代化开辟道路。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执政党是关键。

其四，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从根本上说是自我革命问题。全面从严治党着眼于“谁来领导全面协调推进伟大事业和进行好伟大斗争”，这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当前，我们党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大考验”，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我们党要有效应对“四大考验”，防止“四大危险”，要跳出“历史周期率”，就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我们党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一条基本经验。

如何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伟大事业”、“伟大工程”和“伟大梦想”的必然要求，关键在治、要害在严。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八项要求：第一，落实从严治党责任；第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紧密结合；第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第四，坚持从严管理干部；第五，持续深入改进作风；第六，严明党的纪律；第七，发挥人民监督作用；第八，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重“关键多数”不同，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建设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只有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才能确保公共决策符合法律程序、符合人民利益。“全面从严治党，核心问题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重点是从严治吏、正风反腐、严明党纪，目标是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12]，成为引领中国巨轮破浪前行的“压舱石”。

“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底气。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才能涉险滩、下深水、啃下硬骨头；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才能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综上所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方略”，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障”。“四个全面”有机统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键就在于坚持中国道

路、凝聚中国力量、提振中国精神、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有原则的实践”，必将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和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

-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 《江泽民文选》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5. 《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动全党全国共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N]. 《人民日报》，2015 年 2 月 3 日，第1版。
 6. 《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N]. 《人民日报》，2015 年 2 月 25 日，第1版。
 7.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
 8.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J]. 《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17 日，第1版。
 9.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11. 习近平：《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重大改革建社会稳定评估机制；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N]. 《新京报》，2014 年 3 月 1 日，第4版
 12. 《从严治党锻造坚强领导核心——五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N]. 《人民日报》，2015 年 3 月 1 日，第1版。